

内容提要

传统上对军备控制的研究主要是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对诸如宗教因素、经济因素、人道主义因素、环境因素等非军事因素则关注不够。本文选择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的美国天主教作为个案，分析美国天主教会在运动中作用和影响，研究宗教因素对军备控制问题的影响。

美国天主教是美国三大宗教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单一教会。在其发展史中，美国天主教形成了自身介入政治的特点，进入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天主教的政治议程日趋广泛，他们对生命的关注促使他们对战争和和平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而 80 年代兴起的冻结核武器运动成为美国天主教进行理论反思后施加影响的最佳舞台。

作者认为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美国天主教以发表主教牧函的方式作为最主要的介入手段，力图通过改变公共舆论，间接地动员信徒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放弃直接接触政治精英的机会，对天主教政治精英们开展直接对话，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该个案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天主教介入的优势和局限性，以及这些因素对冻结核武器运动兴衰的影响。

文章在结论部分指出在军备控制领域，特别是以裁军为目的的和平运动中，宗教组织在其中发挥的是提供道德源泉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民众对军备控制问题的态度，为军备控制赢得更多的支持者。但是由于军备控制本身具有的专业化和精英化的特点，宗教组织只能通过间接的影响公众舆论或直接游说个别政治精英的方式来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一旦其对立面采用接受其道德主张但否定政策建议的处理方式，宗教游说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对公共舆论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地丧失有效性。

【关键词】 美国天主教 军备控制 冻结核武器运动

【分类号】 D815.2

Abstract

Previously the study of the arms control issue has been conducted on either policy or technique levels. Comparing with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factor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factors like religion and culture. This thesis tries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religion on the arms control issue in general, and the role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in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in particular.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religions in the US and also the largest church in the country. In the history,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developed its own ways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moved, step by step,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politics. After the 1960'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had expanded dramatically, but its pro-life policy overshadowed the Church's other concerns like the issue of war and peace. It had not been until the 1980s that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began to set the stage for the Church's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Catholic bishops used the pastoral letter as a strategic weapon to promote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aiming at influencing the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tried to convert the Catholic political leaders to their cause. The paper examines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its support for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The paper concludes by pointing out that in the arms control issue of the peace movement, the religious groups did have some moral authority in mobilizing public opinions and attracting followers. However, since the arms control is a specialized field, and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to play the insider's game and to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Church's lobbying skill in grass-root mobilization and its access to the political center could not compensate for this lack of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though recognize even by the opponents of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became less effective in influencing the public opinion when the concrete policy proposals of the Church were rejected, leaving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a declined if not a lost enterprise.

【Key Words】 :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Arms Control,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Classification Codes】 :D815.2

前言

当一个国家感觉到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威胁本国安全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通过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来加以防范。但是这又会使得其他国家感觉到军事威胁，因此其他国家也会增加其军事实力。结果是，不同国家都希望通过发展各自的军事实力来维护国家安全，但实际效果是，它们的安全环境都恶化了。这种情形被称作安全困境。如果相关国家的主要安全目标互相不冲突、它们的安全互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的领导人对未来充分关注、领导人对安全互动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那么，这些国家有可能走出安全困境。也就是通过各自限制和裁减军备来增进相关国家的安全。通过上述思路实现的军备控制，其主要动因是军事安全考虑。¹基于这种思路开展的对军备控制特别是核军备控制的研究主要是以下两个角度：1) 政策层面。主要研究核武器的作用、各国核政策以及核不扩散机制。2) 技术层面。例如各项军备控制条约中的核查技术、核弹头拆卸销毁以及核材料处理技术等。²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军事安全、政治因素、国际机制等等因素对核军备控制的影响学界均有涉及，而对诸如经济因素、人道主义因素、环境因素等等非军事因素则关注不够。本文试图通过对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美国天主教的作用及其影响的研究，探讨一下宗教因素对军备控制问题的影响。

宗教因素能够在军备控制问题中发挥影响力首先取决于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美国是一个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度，宗教组织在美国社会中有着人数众多的信徒。在美国 48 个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18 岁以上的总人口当中，自称无宗教者仅占调查人口的 8.2%。³“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每 10 个美国人就有 6 个认为‘宗教能够解答现在的所有问题或者说绝大多数问题。’”⁴根据美国选举研究中心 1997 年的调查显示，多达 59.4% 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或者说很重要。美国学者赫茨克就指出：“宗教仍然是美国生活和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人民不仅对教会的信心远胜于对其他重要社会机构的信心，而且实际上他们大多数还是教会的成员。教会与美国作为互不往来的分散的个人所组成的“大众社会”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照。”⁵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者发现美国民众参与政治是为了道德的原因，而且用“正义”和“邪恶”这样的词来解释复杂的公共事务。⁶而且在 20 世纪，宗教议程也比 10 年前更为广泛。宗教团体当然也全方位地介入了一些颇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和政教关系问题。⁷在 80 年代宗教团体介入美国政治的浪潮中，美国天主教和宗教新右翼是最为引人瞩目的两大团体。

宗教因素对军备控制问题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体现在宗教组织特别是美国天主教会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发挥的独特作用。80 年代初期紧张的美苏关系和里根政府强硬的军事政策，诱发了以冻结核武器运动为代表的和平运动的

兴起。国会的卷入、MX 导弹的拨款问题、核大战是否能打赢以及星球大战计划的激烈争论贯穿里根总统第一任期的始终。1982 年在美国国会关于冻结核武器运动就有 32 个提案等待表决，在同年 11 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中，8 个州通过全民公决的形式表示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⁸在该运动的进程中，美国天主教作为美国最大的单一教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因此，以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为个案，通过对其过程、方式和效果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宗教因素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独特影响力，同时也可以更深入地研究美国宗教和政治的关系。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对宗教团体介入美国政治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美国宗教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对于宗教组织在军备控制问题中的作用，特别是美国天主教和冻结核武器运动这一课题目前尚无系统的论述。目前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天主教与国际政治以及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历史研究这两方面：

(1) 天主教与国际政治。这是研究宗教和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罗马天主教会参与国际政治的历史，其代表性著作有：艾瑞克·O·汉森 (Eric O.Hanson) 的《世界政治中的天主教会》，在其中的第八章对罗马天主教介入军备控制领域的历史作了一定分析。⁹此外，罗纳德·G·穆斯托 (Ronald G.Musto) 的《天主教和平传统》一书，对天主教和平主义的传统做了历史分析。这两本书都是着眼于历史的角度，对天主教会进行和平运动的背景和过程做了概述，对美国天主教如何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并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2) 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历史分析。对这一运动最全面的分析是托马斯·R·罗肯 (Thomas R.Rochon) 和大卫·S·梅尔 (David S.Meyer) 编著的《联盟和政治运动：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教训》一书。该书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产生、冻结核武器运动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以及运动转型期间群众动员的消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其中对宗教性团体的作用没有涉及。除了这两方面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对美国政教关系进行论述的书籍，如艾伦·D·赫茨克 (Allen D.Hertzke) 的《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对美国天主教介入政治的活动略有涉及。

本文从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渊源着手，对美国天主教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之后，介入军备控制问题的原因和方式并对其介入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力图通过对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武器运动这一个案的分析，从而得出宗教组织的美国天主教介入该运动的优势和局限性。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天主教在其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受到多重挑战的前提下，改变了自己的神学立场，获得了其他军控团体所无法具有的道德权威地位，进而以该权威地位为依托，采取多种介入方式，特别是发表主教牧函，塑造公众观点，动员平信徒参与冻结核武器运动，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由于其自身具有的局限性使得它在具

体的政策问题上丧失本身的优势，无法施加有效的影响。在里根政府表示“核大战不可能获胜，也永远不应该发生”和国会通过没有实际约束力的关于冻结核武器的议案之后，以宗教组织为重要依托的冻结核武器运动开始走向衰落。

文章分为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指出在美国天主教成为美国三大宗教之一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美国天主教的特殊民族主义；而肯尼迪当选总统则标志着美国天主教进入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第二章则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美国天主教在 60 年代以后，伴随着越战的爆发，对“正义战争”理论的反思而形成了“原子时代无义战”的新观念，并进一步将其融入所谓“天衣无缝”的行动策略，建立了支持和平反对军备竞争的神学体系和政治主张，此外美国天主教承受的世界性支持者的压力、自身地位的改变和 80 年代的政治背景，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第三章着重分析美国天主教介入的方式。第四章则是对其介入有效性的分析，指出了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优势和局限性。最后部分是结语，对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表现出的美国宗教介入政治的特点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第一章 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渊源

1. 爱美国与信仰天主教：美国天主教的特殊民族主义

美国天主教，通常是指美国罗马天主教，即在美国境内，教义上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地位，在礼仪上采用罗马教廷的规定，在体制上承认罗马教廷圣统制范围内的天主教会。¹⁰目前，美国天主教是全美最大的单一教派，拥有 47199 名神职人员和 6200 万信徒，占美国人口的 26% 左右；开办了 7151 所小学，在校学生 200 万；中学 1300 所，在校学生 66 万，高等院校 240 所，在校学生 70 万。¹¹

早在殖民地时期，天主教就已经传入了北美大陆。马里兰州是当时天主教徒主要聚居地，1803 年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后，新奥尔良成为了第二个重要中心；1848 年美国获得新墨西哥州，这是第三个天主教中心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天主教徒并没有成为日后美国天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天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 19 世纪的大移民。¹²大批来自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德国和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移民美国。到 1840 年，美国天主教会拥有 16 个主教区、500 名神甫和 663000 名信徒，占当时美国人口的 4%。¹³从 1820 年到 1865 年，有大约 1900000 爱尔兰人到达美国，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这一重大变化对美国天主教的变革起了巨大作用。爱尔兰移民的大批到来极大的推动了美国天主教“美国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天主教教会克服了两次重要的内部危机。第一次是“理事之争”，新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模仿新教教会的形式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天主教会¹⁴，但是随着罗马教廷的反对和美国天主教会迅速吸收爱尔兰人为神职人员而最终解决；第二次是卡亨斯里主义的提出。该主义宣称要求在美国按照移民的原籍设立半独立的教区然后再联合成立全国天主教会，这一明显会导致美国天主教“民族化”的主张最终由于遭到多数主教的反对而失败。这两次危机最终解决之后所带来的影响就是：爱尔兰人，或者说爱尔兰裔美国人在美国天主教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为美国天主教打上了深深的爱尔兰烙印。爱尔兰移民认为做一个天主教徒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爱尔兰人，做一个爱尔兰人也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因此当爱尔兰移民将美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之后，他们就将宗教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信仰天主教和爱美国成为爱尔兰移民的突出特征。这样以爱尔兰移民为主体的美国天主教就同样也具有这种特殊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一特征在日后美国天主教参与美国政治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赫勃格在其关于美国宗教的名著——《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一书中就指出，“在爱尔兰人的领导之下，而且大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独特背景给予爱尔兰教士的各种优势，美国的天主教会得以巩固，成为了一个美国的宗教团体。”¹⁵

2. 从边缘到中心：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程

研究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要以美国政教关系为研究的起点。

政教关系，即政府与教会（宗教组织）的关系，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广义上的政教关系不仅指政府与教会的关系，而且也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这两组关系的协调就构成美国宗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宏观背景，也是研究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起点。

美国协调政教关系的法律基础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但是从一开始，人们对这一修正案的解释就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分离主义者和调解主义者两类。

分离主义者的理解都是根据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的“在教会和国家中建立起一道隔离墙”¹⁶的观点，认为这一条款实质上是规定了美国要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而调解主义者则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没有禁止国会或各级政府在宗教和非宗教之间保持严格中立，仅仅是排除了政府直接确立或赞同某一特定宗教，政府一定而且应该支持个人和集体的宗教行为。¹⁷

这两种观点根本的分歧就是在于如何对待“分离之墙”，分离主义者要求将“分离之墙”加高加厚，必须“巩固得高而坚不可摧……不容许出现任何细小的缺口”。¹⁸而调解主义者则希望是拆毁这堵“分离之墙”。

但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一方面最高法院始终维持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自由原则，使得美国的任何一个宗教组织都无法作为政治实体干预政治或者参与政府决策，并为出于少数地位的教派改善自身状况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最高法院也表示，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从绝对意义上说，完全的分离是不可能的。政府同宗教组织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线远非是一堵墙，而是一个模糊的、不清晰的。因某种特殊关系的所有情况而变化的障碍物。”¹⁹这就为宗教团体在法律的框架内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开展某些政治活动打开了大门。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分离之墙”一方面杜绝了占优势地位的宗教团体利用国家权力进行宗教迫害的可能，并且提供了有利于弱势团体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另一方面允许宗教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平等的介入政治领域。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天主教在美国发展的故事是一个外国教会或者说是好几个外国教会，跟着来自海外的数次移民潮到达，最后变成三大“美国宗教”之一的经历。²⁰在这一过程中，天主教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伴随着新移民的到达逐渐发展起来，其对美国政治的介入也同步展开。

首先，天主教对美国政治的介入是伴随着天主教教育发展起来的。天主教移

民到达美国之后发现，美国的公立学校诵读的是新教的圣经，公立学校拒绝让天主教势力进来，也不愿意提供基金让天主教会设置公立学校。面对这样的境遇，美国天主教徒也唯有大规模建立自身的天主教教育体系作为应对之策，这样天主教开始介入到美国社会的公共事务。

其次，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反天主教运动极大的刺激了美国天主教会。19 世纪中后叶，美国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仅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的反天主教暴乱中，贬斥天主教的言论著作多得不可计数。从 1800 到 1860 年，美国至少出版了 25 种日报、周报、双月报，还有 13 种月刊和季刊，散布传播反对天主教的言论。²¹面对这样的情况，此时拥有近千万信徒的美国天主教会利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宗教自由采取了反击措施，吉本斯主教指出：“一千六百万天主教教徒拥护(美国的)政府体制……在这个国家里教会与国家的分野，……对国家和教会两方面都有好处²²”，他表示天主教反对任何在美国实行政教合一的设想，这是美国天主教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对消除美国新教徒对天主教的疑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 19 世纪中后叶，美国天主教开始在地方政治上崭露头角，天主教的神职领袖与爱尔兰裔的政治家开始结成联盟关系。在一些天主教势力较大的地区，例如纽约市，天主教的主教官邸甚至被称为“权力中心”。²³

第三，1919 成立的“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是美国天主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就对战后的社会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这一计划受到了进步主义者的热烈支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天主教会成立“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该机构是管理美国天主教会世俗活动的统一机构，每年举办神职人员会议，是美国教会对任何社会及文化问题的喉舌。²⁴该机构成立不久，就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反天主教高潮。这次反天主教运动的导火线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问题。1928 年，在保守派新教徒的强烈反对下，纽约州州长，天主教徒艾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获选人，虽然最终没有当选，但是他被提名本身就标志着美国天主教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标志着天主教正在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团体之一。大萧条和二战的爆发，使得美国天主教在介入政治方面更进了一步。1933 年，“天主教工人运动”正式成立，该组织代表了美国天主教中的激进派的观点，致力于社会正义和平问题。此时人数众多的天主教选民也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就很依赖中西部工业州的天主教选票来获得胜利²⁵。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美国天主教的政治参与已经开始逐渐脱离地方政治的范畴，开始涉足于全国性的政治议题。

第四，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成为美国天主教会介入美国政治的新的转折

点。这次会议最终赋予了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上以更大的自主权。它要求“各国天主教会要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道德维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天主教会的政治议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美国天主教中持不同观点的神甫、修女们开始走出教堂反对堕胎、反对核武器、反对贫困。²⁶几乎与此同时，在1960年，天主教徒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当选美国总统，这正式标志着美国天主教已经从美国政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取得了能够与美国新教徒相抗衡的政治地位。针对这一历史过程，研究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学者肯尼思·沃尔德指出，“过去，天主教徒只有在涉及天主教的直接利益时才比较积极地参与政治。教会学校的公共资金问题或者公开的反天主教活动是以往将天主教徒卷入政治领域的问题。……目前天主教徒已在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上立足。”²⁷

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四个阶段是与美国天主教特殊民族主义密不可分的。信仰天主教和爱美国是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天主教介入政治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美国天主教逐渐从一个受歧视的外来宗教变成了美国三大宗教之一，美国天主教不再需要用超过普通新教徒的爱国主义来表现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因此进入60年代以后，在参与政治方面，他们可以不用担心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招来对其是否忠诚的怀疑。60年代以后美国天主教在考虑自身政治议程时，其着眼点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天主教担心的不是被接受而是如何发挥领导作用的问题。²⁸

第二章 军备控制——美国天主教的政治议题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天主教已经从美国政治的边缘进入了美国政治的核心地带。特别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美国天主教在介入美国政治方面显示出更大的积极性，其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80年代连续对美国的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发表主教牧函。在这其中，尤以美国天主教在军备控制方面不同寻常的努力以及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参与特别引人瞩目，本章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军备控制为什么会成为美国天主教的政治议题，而这正是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根源所在。

1. 神学根源——天主教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

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利益团体和工商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在介入政治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他们的神学上的合理性。宗教由于其披戴的神圣性，更具有将其价值规范予以神圣化的能力，从而激发信徒对群体目标的赞同乃至献身。²⁹艾伦·赫茨克指出：“多数（宗教）游说者坦承特殊的宗教传统或者价值体系鼓舞了他们团体（或者他们自己）采取政治行动”³⁰。因此，神学理论促使美国天主教介入军备控制领域，特别是参与到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去。

（1）“正义战争”

从天主教神学传统来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论述是他们介入军备控制问题的起点。在《圣经》的相关章节中，总共提到了三种战争观：“十字军”的理论，“正义战争”的学说，和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思想。耶稣对每一项都提供了基本的辩护。³¹

“十字军”理论也被称为圣战观，起源于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以“捍卫信仰”为口号，在中世纪横行一时，但是随着宗教改革，这一战争观在基督教世界已经不处于主导地位。和平主义的战争观主要强调《圣经》中提到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和平的君；”，教友派、门诺派这些被称作和平主义新教教派的团体奉行这一观点，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和平运动的倡导者。

“正义战争”这一理论，来自于奥古斯都（Augustine）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观点，奥古斯都认为“战争仅在必要时才能进行，而且进行也是为了让上帝把人从紧急状态中解救出来，让他们享有和平。”“寻求和平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进行战争是为了赢得和平。”“‘正义战争’的目的和意图是获取和平。”因此，“即使发动战争”，基督追随者也要“珍惜和平缔造者的精神”。阿奎那将该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正义战争”的三个条件：进行战争的人必须具有作战的权威，必须有“正义的理由”，进行战争必须有争取仁善

和争取和平的“正确动机”。阿奎那后来的追随者又添加了第四个条件战争必须“适当有限地进行”。³²这种战争观，长期以来是天主教所一直坚持的观点。在确信美国所从事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的前提下，美国天主教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民族主义：美国天主教徒认为爱美国和信仰天主教密不可分。在美国历史上，天主教神职人员为了向公众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通常都是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³³因此，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天主教总是鼓励他们的信徒去参见征兵登记。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所有的宗教团体中，罗马天主教和信义宗是最支持军事行动的。调查显示，非天主教徒的同类人群相比，天主教男信徒中倾向于使用武力的百分比要高出15%；而天主教女信徒的这一比例则高出10%。20年后，另一项对11所大学本科生所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6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众多宗教和社会背景的学生中，天主教学生倾向反战的比例最少。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对宗教的虔诚程度和对战争的支持度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天主教本科生的调查表明，祷告的频率越高其对越战升级的支持就越强烈。³⁴

（2）“正义战争”面临的三大挑战

“正义战争”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一些局部战争中为美国天主教对政府的战争行为赋予道德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但是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越南战争的爆发以及拉美解放神学的提出，该理论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核武器带来的挑战。在原子弹诞生之初，罗马教皇庇护十二（Pius XII）表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不能使用可能导致全人类彻底灭亡的武器。但是由于教皇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教皇对核武器的反对态度很快就被淡化了，因此罗马天主教对50年代西方国家发展战略核武器没有提出道德上的谴责。罗马天主教对核武器问题的看法仍然是沿用的“正义战争”理论，对针对军队的战术核武器也没有持彻底的否定态度。庇护十二之后继任的几任教皇都没有对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是正义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分析，相反他们拒绝了和平主义的战争观，这就导致了在整个50年代，天主教徒并没有参与和平运动。³⁵但在此之后，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核时代的战争难以“适度有限地进行”，面临这样严峻的威胁，罗马天主教开始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反思。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加速了这一进程。梵二会议的最后文件表明天主教允许国家进行自卫但是谴责不加区别的摧毁整座城市的行为。1965年罗马教皇保禄六世（Paul VI）在联合国大会上举起双手高声疾呼：“不要再有战争！永远不要发生战争！”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举动开始动摇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

对美国天主教来说，核武器的诞生确实对他们的战争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美国天主教大主教约瑟夫·贝纳丁（Joseph Bernardin）所指出的：“我们

面临的形势不仅仅是量变，而是质变；我们面对着史无前例的武器；”“核时代对我们所持的那种认为有些战争是正义的道德观提出了严重的挑战。”³⁶但是直到越战之前，美国天主教并没有真正彻底的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系统的反思和变革。

越战是美国天主教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水岭。越战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对美国天主教的民族主义立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越战中平民的伤亡促使美国天主教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反思。与此同时，美国天主教内部的和平团体，天主教和平会（Catholic Peace Fellowship）开始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焚烧征兵卡。美国天主教的主流刊物也纷纷加入反战阵营。这种来自于基层的自发的反战运动不能不对天主教会产生巨大影响。在1966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弗兰西斯·斯柏曼大主教（Francis Spellman）的影响下，通过了支持美国介入越南的主教牧函，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到1976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再次发表主教牧函，确认了基层团体的反战态度，并更进一步地谴责了在核威慑战略中把平民伤亡作为因素之一。调查数据也表明越战之后的美国天主教教徒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新教徒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在军费开支等问题上还更加倾向于反战一方。³⁷越战使得整个美国天主教会国家对使用武力的态度由原先强烈的支持者转变为怀疑者。

解放神学的影响。除了核武器和越战的影响之外，解放神学对“正义战争”理论也提出了挑战。这一发源于拉丁美洲的神学运动，主要是强调教会要和穷人站在一起。持这一神学立场的天主教徒强烈反对美国政府采取支持独裁政权的军事行动，即使这些行动是以反共产主义为理论基础。解放神学的这一理念对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主教和神学家对以任何借口采取的军事行动提出质疑。

核武器的诞生、越南战争的影响以及解放神学的挑战，这三者深刻的改变了美国天主教徒对战争的看法，也对天主教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原子时代无义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天主教开始着手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发展，提出了“原子时代无义战”，并希望与美国天主教在其他诸如堕胎、反对死刑等社会问题的立场协调起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政治行动准则。

美国天主教首先着手对战后基督教进行和平运动、介入军备控制领域的进行神学上的总结。1983年6月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发表的《和平的挑战：上帝的诺言与我们的回答》集中体现了天主教由“正义战争”到“原子时代无义战”的理论转变。在这篇主教牧函中，美国天主教对核威慑、军备竞赛和裁军、和平这些

问题提出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核战争的道德判断。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发动核战争的理由，无论其规模控制在多大范围，在道德上都是非正义的。”整篇主教牧函的中心内容是“尽全力来阻止对核武器的使用”。³⁸这是天主教历史第一次力图在正义战争理论和和平主义传统之间寻求妥协，也是天主教试图在承认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前提下，还要努力保护个人良知的一次尝试；此外天主教会还试图通过这一举动，在宗教教育和训诫的功能与作为美国主要社会机构之间寻求某种平衡。³⁹天主教在核战争、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新教主流教派的热烈响应，联合卫理公会在致天主教主教团的电报中说，“感谢上苍！你们为和平、正义作了鼓舞人心的见证。”⁴⁰

美国天主教对待核战争和军备控制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到支持“和平和正义”的宗教团体中来，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全国基督教协会为代表的新教主流派是一致的，但是天主教并没有把这些倾向于自由派的观点带到社会问题方面。在堕胎问题、死刑问题上，美国天主教仍然持保守派的立场，坚决予以反对，这与他们在军备问题上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学者赫茨克指出：“‘美国天主教会议’在经济政策和外交军事政策方面，他们与主张‘和平和正义’的团体结盟，但在社会问题如平等权利修正案、堕胎、资助教会学校及学校宗教活动方面，他们发现自己是正与关注‘传统价值’的团体结盟。”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二者之间的矛盾，1983年主教牧函的起草委员会主席贝纳丁大主教更进一步的把美国天主教支持军备控制、反对核武器，反对堕胎，反对死刑的立场结合在一起，称这些都是以关注生命为核心的，因此是“天衣无缝”的。⁴¹

“正义战争”理论到“原子时代无义战”的转变表明美国天主教在神学上处于“正义战争”和“基督和平主义”之间。在此基础上，“天衣无缝”行动策略的提出，使天主教支持核裁军运动在理论上具有更为严密的逻辑性，有利于他们充分发动天主教信徒参与社会行动。

2. 普世教会的历史遗产——世界性成员的压力

教会除了要代表自己的神学理念之外，另外一大任务是要代表世界范围内本教会的成员。事实上，很多教会是有着救援机构、差会、发展项目的国际机构，其成员遍布全球。罗马天主教是一显例，但信义宗，长老会，浸信会，门诺派，贵格派，“全国福音派协会”，安息日会，当然还有“全国基督教协会”等组织，情况也是如此。⁴²因此美国的宗教组织在考虑对国际性问题所持立场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看作是代表国外支持者——世界范围内受美国外交军事政策影响的教会成员。

作为世界性宗教一部分的美国天主教在对此感受最深，受到的压力也最大。

他们一方面要关注美国国内信徒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对东欧国家的天主教会的呼吁做出反应。在华沙条约体系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天主教都是主流教派。这些国家的天主教会在 80 年代初期都曾发表过支持和平运动的声明。匈牙利的天主教会甚至和政府控制的和平运动开展合作。同样也是在 1983 年，民主德国、匈牙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日本以及法国的天主教会都各自发表了呼吁和平的牧函。⁴³这些牧函表达了全世界天主教徒对战争，尤其是爆发在东西方之间的核大战的忧虑，对美国天主教会很大的触动。

对美国天主教来说，另外一个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压力来源是罗马教廷。按照罗马天主教的传统，美国天主教在教义上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地位，在体制上遵循罗马教廷圣统制，这就决定了罗马教皇在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

对于美国天主教来说，80 年代对军备控制问题的关注与罗马教皇的态度密不可分。1981 年 2 月，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发表了天主教对核战争的看法。在这次集会中，他用日、英、法、西、汉、葡、俄、德以及波兰语对在场的 25000 名听众说：“纪念广岛就要废除核武器。纪念广岛就要献身于和平……我们向全人类承诺将为裁军和禁止一切核武器而孜孜不倦的工作；让我们用信心和关怀来取代暴力和仇恨。”正是在这一教皇讲话的鼓励下，美国天主教教团开始着手起草其 1983 年主教牧函。在贝纳丁主教起草完该牧函第一稿之后，就前往罗马晋见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教皇在和美国天主教代表会晤中，只是对一些总的原则做出了指示，但对具体的政策问题，例如是否支持核裁军等并没有表态，而是表示由美国天主教自己确定，这就使得美国天主教内部保守派希望梵蒂冈否决该主教牧函的企图落空。而教皇的这种举动也鼓励了欧洲的主教们加入该议题的讨论。⁴⁴

3. 社会背景——天主教在美国社会地位的变化

美国天主教能够在 80 年代积极介入军备控制这一美国政治中心议题是与美国天主教社会地位的变化分不开的。在 80 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通常起着保护天主教文化的作用，保护他们的信徒免受敌视他们的反移民文化的伤害。当然在一些城市，某些主教起着政治中间人的作用，在地方官员面前为自己的教堂和教众说话，代表他们的利益。但是到了 60 年代，神职人员所起的这种作用由于一系列事件而受到了削弱。首先，美国天主教徒成为美国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在经济上最为富有的团体，他们不再需要穿着教服的护教者，他们也不再把他们的主教们看做是政治领袖。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在很多与美国教会利益相关的议题上梳理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在教育、住房、种族歧视、堕胎

和其他一系列议题上，政治主动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国会和联邦司法机构，这就使得天主教主教们和地方官员的关系在政治上显得越来越不重要。⁴⁵

随着这些教会内外环境的变化，天主教主教们传统角色的丧失也表明新的机会就在眼前。地方性议题的缺失，使得主教们有机会投身到全国性议题中来。随着美国天主教融合到美国社会主流中的趋势，美国社会中的反天主教情绪也逐渐消退。虽然天主教徒不再把主教们当做政治权威，但是另一方面，非天主教徒也不再恐惧主教们发挥政治作用，参与政治进程。地方政治提供给单个主教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全国性的政治议题给天主教整个神职机构提供了行动的良机。

此外，机构上的变化也为美国天主教介入全国性政治议题提供合适的工具。在梵二会议后取代“天主教福利会议”建立的“美国天主教会”（USCC）⁴⁶力图使美国天主教主教们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一新建立的机构使用了很多专业人员，设立很多关注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的部门。这些机构上的改革“推动整个美国天主教会以及主教团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⁴⁷

4. 政治背景——里根政府的军备扩张政策

70年代末期，伴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之间关于军备控制的谈判限于停顿。进入80年代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又出现了重新开始军备竞赛的迹象。1981年10月2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宣布在未来五年里美国的军费开支将达到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1981年11月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号指令中表示要在核大战中获胜。此外里根政府内高级官员对核大战所持的强硬态度，引起了美国社会广泛的担忧。从理论上说，美国的两党体制是应对民众的这些关注有所反应，但由于“党派政治止于国内政策”的传统，因而美国的外交军事政策通常是属于总统独立处理的领域。而里根总统用的诸如“邪恶帝国”之类令人回想起十字军式战争观的言辞，极大地刺激了致力于改革“正义战争”理论的美国天主教会。面对这样的形势，美国天主教的个别主教首先开始行动起来。旧金山大主教奎尼（Quinn）首先公开发表声明反对里根政府的政策，并在1982年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斯托克顿教区大主教罗格·莫汉尼（Roger Mohony）也在1981年12月30日发表了主教牧函，把核军备竞赛和世界穷人的痛苦联系起来。此外，甚至连更为保守的洛杉矶枢机主教蒂莫西·曼宁（Timothy Manning）也批评了军备竞争。⁴⁸这些主教的个人行动标志着美国天主教做为一个整体即将开始大规模介入军备控制议题。

第三章 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的美国天主教

美国天主教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在神学、组织结构已经社会地位上变革为他们在 80 年代大规模介入军控议题奠定了基础。本章将对美国天主教介入 80 年核心和平运动——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方式进行分析。

1. 冻结核武器运动：80 年代的和平运动

冷战时代针对军控问题，各国非政府组织的反应方式通常是开展支持军备控制、反核反战的和平运动。在这一时期，这种运动有过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反核和平运动。在欧洲，英国 1958 年发起了争取核裁军运动，开创了以抗议推行“原子武装”、反对“原子死亡”为目的的复活节进军这一运动形式。第二次高潮是以反对越南战争为主旨的世界和平运动。第三次高潮出现在 80 年代初。1979 年 12 月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是这次浪潮的直接诱因。1980 年 4 月，英国知识界发出“欧洲核裁军呼吁”，提出“既不要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也不要 SS20 导弹”，建立一个独立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从波兰到葡萄牙的无核欧洲。“呼吁”迅速得到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英国、西德、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这五个被指定部署中程核武器的国家的抗议活动最为激烈，示威人数经常达到数十万乃至一二百万。“这时在美国也爆发了冻结核武器运动，主要内容是呼吁“(美苏) 双方冻结核武器的生产、试验和部署，并且停止生产、试验和部署用于核武器投掷的导弹和新型武器。”这一运动开始于 1981 年 3 月，拥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1800 个地方分支组织，在 1982 年为联合国第二届裁军特别大会在纽约动员了 75 万人进行游行。冻结核武器运动有 6000 多个组织的 1000 万人参加。⁵⁰

美国宗教组织与冻结核武器运动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冻结核武器的倡议是“美国教友派服务委员会”⁵¹的伦德尔·弗斯博格 (Randall Forsberg) 首先提出的。弗斯博格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该倡议是他为教友派服务委员会制定的行动建议。这一建议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很多和平运动组织认为该建议的目标过高，他们更愿意从事其他更容易达到的活动，例如争取参议院通过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协议 (SALT II)。但是里根总统就任后提出美国能够在核大战中取胜，他对军备控制的冷漠态度以及他重整美国军备，发展 MX 导弹和巡航导弹的举动，使得冻结核武器这个概念开始获得广泛的支持。

从 1981 年开始，以专业团体、宗教团体和传统的和平运动团体为核心的冻结核武器运动开始崛起。在这一阶段，美国的主流宗教组织纷纷发表宣言对冻结核武器运动表示支持。1981 年，圣公会主教院以致教友公开信的新式，谴责使用核武器。美国的两大信义宗都分别做出决议，强烈呼吁销毁核武器。1982 年，

联合长老会最高司法机构更直截了当的要求政府冻结核武器，再也不能充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⁵²

1983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发表了主教牧函，明确表示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成为整个这场运动意义深远的转折点，在美国引起了巨大轰动。随后MX导弹的生产和部署成为了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中心议题。此时众议院议长、天主教徒蒂普·奥尼尔（Thomas P. O’Neill）对里根总统表明“他将不提交有关MX导弹的议案，他本人也不会对此投票。他说这事有关良心。”⁵³1983年，国会通过了对MX导弹的拨款同时也通过支持冻结核武器的象征性议案，再加上1984年里根总统连任成功，这标志着冻结核武器运动走向衰落。1987年，冻结核武器运动和“明智核政策委员会”（SANE）合并，地方组织减少到了270个，在三十个州的成员也只有17万人。⁵⁴自此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冻结核武器这个概念也成了昨日黄花。

2.美国天主教的介入方式

鉴于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美国宗教组织参与政治活动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宗教、慈善和教育机构享受完全的免税优惠，但绝对禁止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将失去免税地位。因此美国天主教会是不能够为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竞选捐款的。但是美国天主教会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参加某些政治性活动的。根据美国联邦《国内税收法典》第501条（C）（4）的规定，社会福利机构有权参与国会游说活动，而慈善和教育机构可以成立社会福利机构。⁵⁵而美国天主教会就附设有这类社会福利机构并有自己的游说组织：“美国天主教会”⁵⁶游说办事处。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所采取的方式来说，主要包括：直接行动、精英动员和关键联系人、联盟战略及大规模选民动员。

（1）直接行动

直接行动是指教会不借助于政治游说而直接动员自己的信徒参与政治活动。其方式主要包括有和平示威、公民不服从运动、塑造公共舆论以及极端的暴力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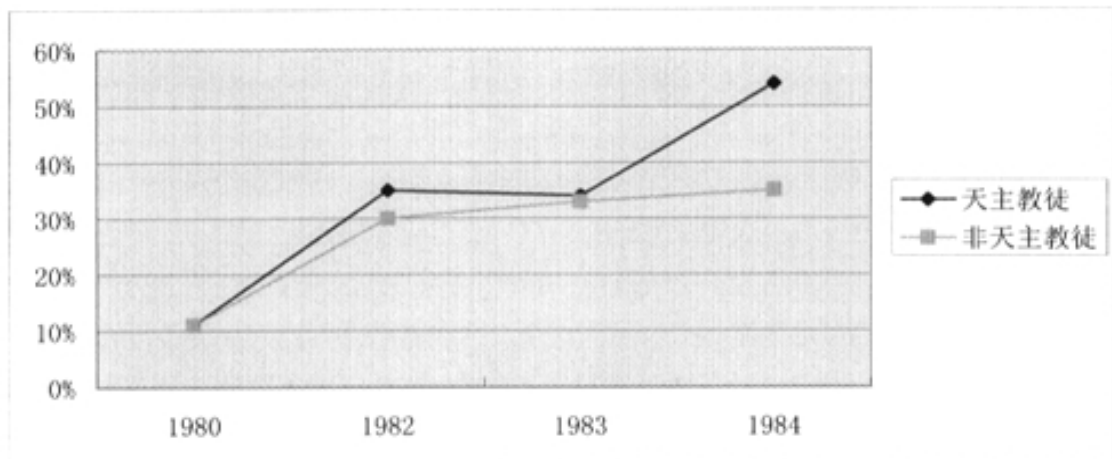
（A）塑造公共舆论。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变了天主教徒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为冻结核武器运动提供了大批支持者和活动分子。美国天主教会改变其信徒观点的方式就是发表了1983年主教牧函：

《和平的挑战：上帝的诺言与我们的回答》。这可以说是美国天主教主教团采取最主要的公关方式。虽然在牧函中，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一再表示无意用信仰来迫使自己的信徒在公共政策方面采取“特定的立场”，但是他们的牧函至少劝告天主教徒“在面临特定问题时要有道德方面的考虑。”从教会公开声明中可见，

主教们希望通过鼓励教众来发表看法的方式来间接改变公共政策，而不是通过游说活动来直接改变公共政策。⁵⁷这种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优势很明显：如果教会是采用政治游说来施加影响的话，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政治家们讨价还价，而这样的举措会被他们忠实支持者看做某种程度上的对信仰的妥协。事实上，如果天主教会直接介入到细节的立法过程，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宗教价值观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一名国会助理就这样指出：“教会的强项在于培养觉悟而不是在于实际游说。……而国会寻求达成共识的政策。”⁵⁸

天主教在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时就将主要精力放在通过公开发表牧函和声明等方式上，来培养天主教徒对核政策看法。这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安德鲁·格雷(Andrew Greeley)认为《和平的挑战：上帝的诺言与我们的回答》是“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领域中，改变公众观点最为成功的范例。”⁵⁹根据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 1983 和 1984 分别进行的社会总体调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 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天主教徒在对待军备问题以及冻结核武器运动方面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1983 年社会总体调查中，天主教徒在回答“美国军费开支是太多或太少还是正好？”时，有 34% 的人选择的是“太多”，而在 1984 年选择“太多”这个答案的天主教徒的比例达到 54%。这就意味着有多达 1000 万的天主教徒改变了看法。另一项民意调查则显示，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天主教徒增加了 14%，而同一时期新教徒对该运动的支持则只增加了 9%。⁶⁰（参见图一）

1980-1984 赞成美国军费开支“太多”的百分比



图一

(B) 游行示威。这是一种最常用的直接行动方式，可以引起媒体的高度重视达到将自己观点和政治主张广泛传播之目的，同时还可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对天主教会来说单独采用这种方式会加深美国公众对主教们介入政治的忧虑，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是保持低调，但这并不意味着游行示威不是一种有效的介入方式。

天主教徒通常是参与由非宗教性反战团体组织的游行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例如在 1982 年联合国第二届裁军特别大会期间在纽约就有 75 万人进行游行，天主教徒也参与在其中。

(C)“占领”行动。这是冻结核武器运动中极端分子所采用的一种方式，主要是闯入美国主要的核武器工厂或核武器基地，阻挠核武器生产和安装。在这其中美国天主教菲利浦·贝里根⁶¹(Philip Berrigans)等人发动的一系列行动最为引人瞩目。他们认为美国人民应该遵循《圣经》的训诫“化剑为犁”。1980 年 9 月 9 日，包括贝里根在内的 8 人闯入了通用电器公司设在宾西法尼亚州的核弹头工厂，并且象征性的“拆除”马克 12A 型弹头。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化剑为犁”的行动：在康涅狄格州的格兰顿，他们“拆除”了核潜艇的武装；在通用电器公司一个核工厂泼血以示警告；在特拉华州，“拆除”了潘兴、MX 以及巡航导弹的部件；一些人还在 1983 年感恩节那天用锤子敲击 B-52 轰炸机，并泼上鲜血；1984 年复活节，“化剑为犁”行动的成员在奥兰多市的马丁工厂，破坏潘兴二型导弹部件，并泼血以示警告。⁶²这些极端行动给其他天主教教俗人员以很大的冲击，同时也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核问题的重视。

(2) 精英动员和关键联系人战略

精英动员是指宗教组织通过增加接触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来施加压力。他们倾向于利用和政治精英的关系进行游说。在这一点上，宗教组织具有其他和平组织所没有的有利条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并且信徒众多的美国天主教在这一方面优势十分明显。美国天主教的一名游说者就表明他们所拥有的优势：我们在 30 个州有天主教会议，我们能够召集州会议主任，他们是律师（或者他们有律师）。他们在州立法层次进行游说，并有接触当地参众两院议员的渠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保持一个重要的联络网。⁶³

与此同时，由于宗教组织信徒的多元化，这种精英接触不仅仅局限于国会，也发生在与宗教组织在冻结核武器问题上高度对抗的行政当局。这就大大扩展了宗教组织施加自己影响的渠道。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天主教利用发布 1983 年主教牧函的机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这些听证会邀请了很多专家与会作证，其中包括神学家、政治学家、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及军事官员。他们都在听证会上作证并回答问题。前任和现任的政府官员也参加了这些听证会，他们包括卡斯伯·温伯格、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尤金·罗斯托、爱德华·罗尼、哈罗德·布朗、詹姆斯·施莱辛格、杰拉德·史密斯、赫尔姆特·桑尼福德、赫伯特·沙维尼、大卫·林伯夫以及罗格·莫兰德。⁶⁴此外，旧金山教区大主教奎尼作为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证。⁶⁵通过这样的机会，天主教可以充分地对抗和他们类似观点的各类精英进行动员，鼓励他们介入反对核

武器的行列，同时也扩大自己的力量。

而关键联系人关系网是与有目标的动员相关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聚焦战略，即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十分老练的支持者身上，他们能够对来自宗教团体的压力做出迅速的反应。天主教会利用自身的渠道，可以直接联系到关键性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身为天主教徒的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在关于和平和人权的问题上受到了天主教修女游说组织的影响，因此当他在遇到作为冻结核武器运动组成部分——MX 导弹问题的时候，明确告诉里根“他已从道义上承诺要阻止进一步发展 MX 导弹”。⁶⁶

(3) 联盟战略

冻结核武器运动作为一个单一议题的政治运动，其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的各种组织之间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美国天主教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态度，他们不仅与支持“和平和正义”的主流新教结成了联盟，而且还与其他专业团体、和平组织结成战略同盟。在参与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团体中就有与美国天主教信仰相距甚远的专业团体，例如“物理学家支持社会责任委员会”、“军备控制律师联盟”等等，这从政治运动的结盟理论来说是很合理的。在政治运动的结盟理论中，对成员团体之间的关系，作了如下的描述：

	成员重叠	
政治共识	低	高
低	反对	反对
高	合作	竞争 ⁶⁷

该图表表明，在政治运动中，如结盟成员政治共识低，无论他们各自成员是否会有重叠，都是相互对立；如果政治共识高，则成员重叠程度低时进行合作，否则就是一种竞争性关系。从这个理论出发，参与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天主教会与这些专业团体在成员上重叠度比较小，彼此之间存在的是相互合作的关系。特别是在州一级层面上，宗教组织和其他和平团体进行十分有效的合作。例如，在加利福尼亚这个有着大量军工企业的州里，宗教组织和其他团体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首先收到冻结核武器的倡议的是加州宗教界反对军备竞赛中心（Interfaith Center to Reverse the Arm Race）的安妮·萨瑟兰（Anne Sutherland）。她随即与一名反对核武器的洛杉矶商人，哈罗德·维勒斯（Harold Willens）进行合作，征集到80万人的签名，将冻结核武器作为公民投票的第12项列入加州大选之中。⁶⁸在这一过程中，天主教会特别是北加州旧金山教区和斯托克顿教区的两位大主教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旧金山教区奎尼大主教在里根公布战略防御倡议之后2

天，就在该市一宗教节日上签署牧函谴责军备控制，明确表示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要求天主教医疗人士反对“军民一体紧急医疗体系”，并且鼓励天主教教徒提出创造性的建议，来促使军用技术转为民用。斯托克顿教区大主教莫汉尼以及洛杉矶枢机主教曼宁也都表示反对里根的军备扩张计划。当 1982 年加州对该项动议进行表决时，天主教的立场已经表达得很清楚，这就使得天主教的主教们和基要派处于对立。保守的福音派领袖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就向他的支持者发邮件警告他们小心加州的“冻结论者”。⁶⁹

(4) 大规模选民动员

大规模选民动员指的是“旨在发动大量选民的支持，并向国会各议员表明他们的选区中有成千上万的选民强烈关注某一议题的战略。”⁷⁰在利用这种手段方面，基要派团体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主流新教团体和天主教会在“和平”问题上成功的动员了支持者。这种对支持者的动员是主流新教、和平主义教会、天主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再加上自由派犹太团体发挥集体影响力所达成的。他们组成的是一个“和平关系网”，在这其中，单一教会的努力并不是很引人瞩目。美国天主教也是如此。这些主流宗教组织再加上规模较小但是很活跃的和平教派，发挥一种巨大的集体动员能力。在进行选民动员时，和平主义教派，例如贵格派，兄弟会以及门诺派，他们是领导力量。这些教派，尽管成员人数较少，但是在华盛顿却有较大的办公室和较长的直接邮寄名单。例如，门诺派有 6000 人可以邮寄立法警告信件。在作为冻结核武器运动一部分的 MX 导弹问题上，这些宗教组织对国会议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关于 MX 导弹的辩论中，很多国会办公室接到了来自全国神职人员的电话，他们是被各种信息网动员起来的。⁷¹

从本章对美国天主教介入方式的探讨来看，塑造公共舆论运动尤其是发表主教牧函改变平信徒观点是美国天主教进行政治介入的重用手段，这种方式一方面避免了美国社会对天主教会过分政治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又确实能够对公共政策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他的介入方式，例如精英动员和关键联系人战略、联盟战略以及大规模选民动员都是以对平信徒觉悟的培养为前提的，只有让平信徒接受教会的观点，这些介入方式才能够发挥作用。而且无论天主教会采取的什么样的介入方式，他们始终与冻结核武器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大部分的努力都是提供外部支持，如提供可以说服民众的牧函，发表声明支持该运动，但始终没有在人员和财政上直接介入该项运动。

第四章 对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评估

如果说前三章是试图回答美国天主教为什么要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以及美国天主教怎样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那么本章将要探讨的问题是美国天主教介入的效果。本章将就影响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一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所具有优势和劣势,从而对宗教介入政治的有效性做某种探讨。

1. 天主教介入的优势

美国天主教由于本身的特点,在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其他组织和团体所不具有的优势:

(1) 提供道德权威性

美国天主教介入军备控制的原因之一是神学理论。神学对现实生活的回答,给宗教组织提供了道德权威性。1997年美国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也表明,如果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没有道德和伦理上的重要性,58.9%的美国民众对教会的意见并不重视。因此,美国天主教能否有效的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关键在于能否具有道德和伦理上的权威性。美国天主教主教牧函的发表,制定了核战争时代基督教会应恪守的道德信条,反映了天主教会及其他基督教宗派对待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立场。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宗教组织在核武器问题上的道德权威对支持里根政府的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同样属于宗教组织的美国宗教右翼虽然和里根政府关系密切,但是却无法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大力支持里根,根源就是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美国天主教具有道德权威性。一名福音派人士就指出:“全国福音派协会受它的支持者所制约。该协会在历史上有很多和平主义福音信徒。因此我们不能为MX导弹以及总统的军事预算进行游说”,与此类似,一名宗教右翼人士也指出,“我难以使自己确信支持MX导弹是符合圣经的。”⁷²

但是美国天主教的道德权威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最先的挑战来自于里根政府:他们质疑该运动是否对美国忠诚,并攻击冻结核武器运动反映苏联的利益。里根政府的这一举动从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纽约时报》1983年5月9日发表了一篇对在核潜艇制造厂工作的天主教教徒的采访。一名工程师提到了苏联奉行无神论,他说:“我不认为他们(苏联)会关心上帝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他们要听得懂的东西——我们的遏制力量。”⁷³从这个例子来看,里根政府宣传的冻结核武器运动有利于苏联不利于美国的观点是获得相当一部分天主教徒的支持的。但是天主教会对此也进行了反击。当记者采访时提到里根总统指控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某些成员受苏联欺骗,费城的卡罗尔枢机主教断然拒绝了这样的指控,他说:“不要和我提这个,我是波兰人。”⁷⁴作为美国天主教会中保

守派和反共主义的领袖，卡罗尔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支持有力地回击了里根政府对该运动代表苏联利益的指控，维护了天主教会在信徒心目中的道德权威性。

对天主教会道德权威性的另一挑战来自于对其立场变化的质疑。正如第二章所提到的，美国天主教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立场是其理论巨大变革的结果。针对这一变化，一些媒体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冷战时期的枢机主教福尔顿·谢恩（Fulton Sheen）表示，核大战可以是正义的，而现在的一些主教支持某种形式的冻结。现在的教会是不是过于极端？”⁷⁵这种质疑确实在天主教徒中间造成了某种混乱，使得其道德权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整体上来看，在整个冻结核武器运动期间，美国天主教会的道德权威地位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就天主教信徒来说，圣母大学的研究表明，五分之四的教众接受教会在军备问题上的道德权威地位。不仅如此，美国天主教的道德权威地位还因为新教教会的承认而得到了加强。里根政府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国天主教所提出的核伦理和核道德，1983年5月4日，当里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他的政策和天主教主教牧函之间的分歧时，他表示：“他们在为和平寻找途径，努力促进和平。而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⁷⁶不久，里根就公开表示：“核大战不可能获胜，也永远不应该发生。”⁷⁷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具体的政策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美国天主教会在冻结核武器问题上的道德权威是得到了普遍承认。

(2) 提供稳定的支持者群体——天主教神职人员

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天主教神职人员之间经过妥协获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与其他内部分崩离析的团体不同，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上一个权威的声音来代表全体主教说话的。“‘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权力和经济上的壮大使得单个主教的影响力不再重要。”⁷⁸“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这一特征使得和平牧函发布以后，其内部基本上保持了团结和一致，这就为冻结核武器运动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支持者群体。

在刚刚起草1983年主教牧函时，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内部在核武器问题上分署于5个派别：

- 1) 宗教抗议派：这是遵循美国天主教激进主义传统的团体，有57名成员。他们的立场是和平主义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核遏制战略和核武器的生产。他们采取的行动也与贝里根等人的类似，经常采取“占领”这类行动。
- 2) 主流自由派。这一团体是由美国天主教主教团领导层构成的，包括奎尼、贝纳丁等人。其中奎尼被人们认为是美国天主教中进步力量的领袖。他们的观点在1983年和平牧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3) 波兰裔派。这是由教皇密友波兰裔费城枢机主教约翰·卡罗尔所代表的。他在神学和其他社会问题上著名的保守派，并且以反共产主义而闻名。但是他表示支持通过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措施来实施双边或集体的核裁军。他的立场表明，神学上的保守派也支持某种程度的核裁军。
- 4) 正义战争和自卫论派。此派论点在纽约教区最为流行。该教区主教同时也是美国陆军随军牧师。纽约教区枢机主教、随军牧师库克在向美国随军牧师发表的公开信中强调“和平牧函并没有说核遏制战略是不道德，这种观点可以接受。”另一位大主教欧康纳则表示了对 MX 导弹、B1 轰炸机以及星球大战计划的忧虑。他们对“核遏制战略是可以忍受的”的强调，使得保守派将和平牧函描述成支持单边核裁军的图谋落空。
- 5) 民族主义和反共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新奥尔良的菲利普·汉纳，他公开批评这封主教牧函并且对起草委员会主席贝纳丁进行了攻击，宣称他违背了罗马教廷的意志。⁷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最终的主教牧函中对核大战的谴责，对核遏制战略的模糊表达，以及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支持，是获得了前四派主教的支持。他们占据了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绝大多数。最后的结果也是如此，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通过三天辩论之后，以 238：9 通过主教牧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显示了一个团结的支持和平的神职人员群体。这与在面临堕胎等社会问题时，左右两翼的神职人员发生的明显分歧显然不同，出现这种一致性根本的原因是圣经的和平观以及天主教对生命的关注。

2. 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局限性

美国天主教在给予冻结核武器运动以道德权威和稳固支持团体的同时，也暴露出其本身的局限性。

(1) 教会领袖与平信徒政治精英的意见分歧

传统上人们认为美国政治精英的教派归属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突出的例子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天主教徒、前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赫茨克在《信仰与倾向：宗教选民与华盛顿精英》一文中也认为，国会议员的宗教信仰对他们在美国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态度具有决定性影响。⁸⁰但是平信徒政治精英的政治倾向是由宗教信仰、教育背景、选区利益、个人经历等等众多因素构成的，不能说宗教信仰构成了国会议员的投票倾向，只能说国会议员的投票倾向和他的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⁸¹此外，平信徒政治精英是否接受教会

领袖的政治观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个案中，美国天主教会与他们的平信徒政治精英之间分歧巨大。以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为代表的 24 名天主教国会议员对天主教领袖提出了挑战。他们在主教牧函发表前，给该牧函起草委员会的贝纳丁大主教写了一封题为《核时代的道德澄清：给天主教教俗人员的一封信》的公开信，表示他们的反对态度，并且强烈谴责苏联。这封信件三易其稿，并且公开出版来争取支持者签名。此外，里根政府内的天主教徒也对天主教神职人员进行了反击。1982 年 7 月，天主教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威廉·P·克拉克（William P. Clark）致信给教皇代表，抱怨美国天主教会的公开信无视政府在军控方面的努力。同年 11 月，克拉克以里根政府天主教发言人的姿态向 285 名美国天主教主教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代表里根总统，舒尔茨国务卿，温伯格国防部长，罗斯托署长以及其他行政官员，”努力说明行政当局的立场是有道德方面的考虑的。克拉克信函坚持核威慑概念，并且极力渲染了里根政府有关军备控制的倡议。此外，天主教徒、前劳工部长詹姆斯·麦克法登（James McFadden）也致信“美国天主教委员”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信中警告美国天主教徒注意主教们正把教会带离传统的天主教的立场。他说：“这一牧函草稿的后果是将教会政治化。”⁸²

海德信件和克拉克信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天主教平信徒政治精英和宗教领袖之间的分歧：部分平信徒对宗教领袖的道德权威虽然无法置疑，但是对于宗教领袖的具体政策建议则强烈反对，即出现了对宗教领袖的立场整体上肯定，但是对具体措施和细节上加以反对的现象。从理论上讲，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对美国宗教史的研究表明“天主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的主流组织，那么它就不得不迎合这个使教会衰落的社会。……当天主教处于社会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时候，他们代表着独特而相当团结的信徒，这些信徒接受教会的权威。现在很多美国天主教徒，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并不觉得必须接受教会指示，更不用说它的政治影响了。”⁸³J·D·亨特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宗派的依附关系减弱，宗派认同对人们看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也降低了。”⁸⁴因此，平信徒政治精英可以在肯定宗教领袖的道德权威的同时，具有自己多元化的政治倾向，这就制约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2）普通平信徒的冷漠

对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最主要的手段——塑造公共舆论来说，最致命的威胁是普通平信徒不关心的态度。对塑造公共舆论运动来说，它的目标就是改变公众在某些议题上的观点，因此目标群体应该是处在有效的宣传攻势之中的。⁸⁵美国天主教会选择的主要宣传渠道是教堂，通过各个教堂宣讲主教牧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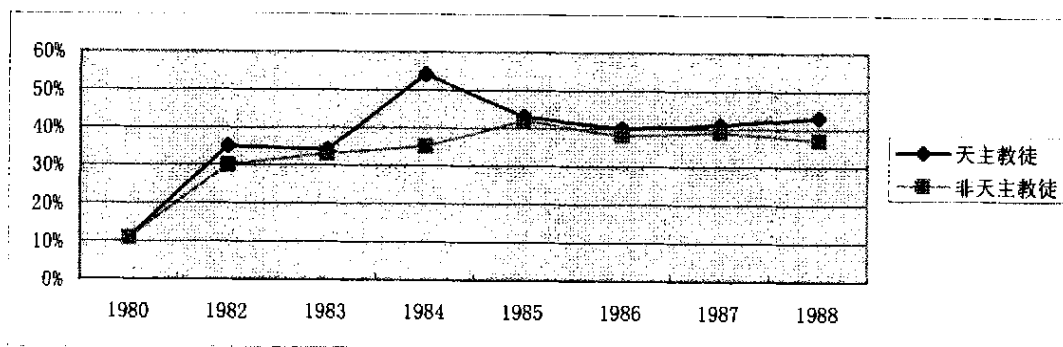
方式来对普通平信徒进行宣传。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最支持主教牧函的人群是经常出席教堂活动的人。圣母大学对天主教教区生活所作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该项研究表明天主教的“福音派”——经常出席教堂活动、重视灵性并且和社会联系紧密的天主教徒，对削减军费开支和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支持度更高。总得来说，与教区联系紧密的天主教徒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支持度要比天主教徒平均水平高出 10-20 个百分点。⁸⁶在研究天主教大众对待核武器问题的态度时，大多数分析家都认为对宗教越虔诚其对战争的反对就越强烈。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那些对宗教并不十分虔诚、出席教堂次数很少的普通平信徒，对于这一事件的公开辩论甚至牧函本身都知之甚少。而对于从媒体中获得消息的人来说，他们是最不可能接受新信息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使得他们对新的信息刺激产生了“免疫”功能。⁸⁷这就导致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天主教信徒未能接受到教会领袖传来的信息，从而也无从响应。

(3) 效用的短暂性

由于美国天主教发布的主教牧函长达 150 页，绝大部分信徒都没有通读过全文以及在政治领域教会对平信徒影响力的局限性，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期间发挥的作用出现了短暂性的特点。

根据盖洛普 1987 年所作的调查，多达 2/3 的天主教徒表示未曾听说过该主教牧函，另有 5% 表示不确定，只有 29% 的调查对象表示知道有该牧函的存在。当在接下来的问题中对那些知道存在该牧函的调查对象进行了进一步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支持该牧函的内容，57% 的人表示赞成，29% 不赞成，14% 未表明态度。这样总计下来全体天主教徒中不超过 17% 的人接受了主教牧函所传递的信息。从 1980-1988 所作的社会总体调查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天主教徒在军备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回归美国社会平均水平的态势，显示出主教牧函仅仅在 1983-1984 这个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之后就处于衰落阶段。⁸⁸（见图二）

1980-1988 认为美国军费开支“太多”人数百分比



图二

(4) 缺乏专业技术团队

与美国天主教在道德权威方面的情况不同，在涉及到技术层面和立法层面的

时候，美国天主教缺乏专业团队来帮助他们。因为冻结核武器运动本身就涉及到很多与核裁军有关的技术问题，比如如何实施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如何在保持战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削减。在进入立法程序之后，如何对国会议员进行有效的游说，如何使用立法措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天主教会之前涉及较少的领域，而且从他们主教牧函起草委员会的组成来看，也主要是神职人员，其雇佣的5名咨询人士也都是神学家⁸⁹，没有核技术和立法方面的专家，这就使得他们在涉及了类似冻结核武器运动这类政策问题时，很难做出专业的回答，从而降低了他们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的可信度。

对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优势和劣势的探讨，也部分解释了冻结核武器运动兴衰的原因。冻结核武器运动从它兴起开始就着三重的目标：

1. 改变政府核政策。根据1981年3月冻结核武器运动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宣布的计划来看，该运动的目标就是要让决策层实施冻结核武器计划。这一目标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即使国会通过的关于冻结核武器的议案也是象征性，并没有确切的时间限制和约束力。
2. 改变社会价值观。冻结核武器运动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改变社会价值观，为旧问题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寻找新问题，或者把问题从私人领域带到公共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冻结核武器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3. 改变政策制定过程。冻结核武器运动的领袖们希望能够在传统是行政部门独占领域的核战略和军备控制问题中引入新的力量。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功最明显的表现是国会发表了支持冻结核武器的决议，但是这一决议也再三声明“该决议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该高于宪法规定的总统缔结条约的权力”，⁹⁰因此在这一方面只能说冻结核武器运动只是获得了象征性的胜利。

美国天主教所具有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冻结核武器运动在上述三个目标上的得失。首先，美国天主教作为宗教组织的特性以及在立法和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的缺乏，核政策之争对大多数普通天主教徒来说是未知领域。其次，改变社会价值观是冻结核武器运动大获成功的方面，这与美国天主教发动的塑造公共舆论运动密不可分，而天主教的道德权威地位以及神职领袖的高度团结都大大加强了对社会的影响力，重新塑造很多受众的观点和看法。第三，在政策制定过程方面，美国天主教与同教派政治精英的巨大分歧，制约了冻结核武器运动改变决策模式的努力。

结论

宗教组织在介入政治的过程中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非精英和非专业。非精英指的是宗教组织所代表的群体。宗教组织通常代表的是自己的信徒或者支持者，而研究表明非精英的阶层和群体，例如蓝领工人、少数民族等，是宗教组织最忠诚支持者。⁹¹非专业指的是宗教组织介入政治是以其价值观作为出发点，大多数宗教游说者都用其特殊的宗教传统或政治行动主义的一套价值观来激励他们团体。⁹²对很多宗教团体来说，议题本身的技术问题和立法过程中的技巧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介入过程中体现自己的宗教价值观。对军备控制议题来说，由于其本身政治决策的特点，更多的表现出需要理性的分析和直接的精英沟通渠道。因此，宗教组织介入军备控制问题，就面临着精英和非精英、专业与非专业的矛盾。

从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这个个案来看，美国天主教介入的理由最主要的是其神学理论。这种神学理论是根植于其本身神学传统，根据时代变化提出了核伦理。在介入方式方面，美国天主教依靠的主要不是对精英的游说，而是通过对信徒发表主教牧函，改变教徒的观点来达到自己的政策目的。而对于冻结核武器这一议题来说，从决策上来看，“党派斗争仅限于国内政治”这一原则很好的维护了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权威，从而也就使得它基本上是属于美国政治生活中非常精英化的议题。其次，冻结核武器运动涉及的技术问题，不如核查机制互信机制的确立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因此从美国天主教介入该议题的开始，精英与非精英、专业与非专业，这两个矛盾就成为了阻碍其发挥作用的重大障碍。

面对这样的困难，美国天主教也做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首先，它以完善的理论来阐述自己的道德主张，以对人类的关爱来作为其政策主张的基石。其次，它采取和专业团体结盟的策略。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美国天主教与物理学家支持社会责任委员会、军备控制律师联盟等专业团体结盟，用其盟友的专业性来加强自身的地位。第三，它也加强了对政治精英的直接游说。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美国天主教利用发布主教牧函的机会召开听证会，与天主教政治精英直接接触。

这些举措取得相当的成效：美国天主教有力的巩固了自身核伦理方面的道德权威地位，迫使持反对态度的里根政府接受它的道德主张。此外，天主教信徒的观点也在神职人员的影响下出现了剧变，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社会在军控问题上的民意。但是其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正如在第四章所指出的，其政策目标的失败、影响力的短暂性都暴露出了宗教游说本身的局限性。

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这个个案说明，在军备控制领域，特别是以裁军为目的的和平运动中，宗教组织在其中发挥的是提供道德源泉的作用，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改变民众对军备控制问题的态度，为军备控制赢得更多的支持者。但是由于军备控制本身具有的专业化和精英化的特点，宗教组织只能通过间接的影响公众舆论或直接游说个别政治精英的方式来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一旦其对立面采用接受其道德主张但否定政策建议的处理方式，宗教游说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对公共舆论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的丧失有效性。

当然通过个案研究军备控制问题上宗教因素的作用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对一些诸如美国天主教自身特点所带来的影响是否在其他类似研究中有普遍意义还有待研究。此外对宗教游说的其他手段，如利用政治精英的个人宗教经历来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在宗教因素与军备控制这一课题的研究上，本文仅仅是一次尝试，希望能够引起学者们对军备控制中诸如宗教之类的非军事因素的思考，不断拓宽研究的维度。

注释：

¹周宝根、李彬：《军备控制中的非军事因素》，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第4页。

²孙向丽、王德礼：《核军备控制的研究现状与前景》，载《核物理动态》1995年第4期，第77页。

³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页—第4页。

⁴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95) , p.28.

⁵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Knoxville,Tenn.: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p.6.

⁶Kenneth D.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7), p.27.

⁷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p.6.

⁸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p.10.

⁹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322.

¹⁰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第137页。

¹¹出处同上，第160页。

¹²[美]W·赫勃格著，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4年，第134页。

¹³Felician A. Foy & Rose M.Avato Eds.: *1998 Catholic Almanac* (Huntingto, IN.: Our Sunday Visitor, Inc., 1997), p.397.

¹⁴[美]W·赫勃格著，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第138页

¹⁵出处同上，第144页。

¹⁶[美]梅尔利·D·彼得森注释编辑，刘祚昌、邓红凤译：《杰斐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545页。

¹⁷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¹⁸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第255页。

¹⁹出处同上，第251页。

²⁰[美]W·赫勃格著，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第133页。

²¹[美]J·D·亨特著，安荻等校：《文化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²²[美]W·赫勃格著，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第147页。

²³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 p.167.

-
- ²⁴[美]W·赫勃格著,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第152页。
- ²⁵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170.
- ²⁶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p. 42.
- ²⁷肯尼思·沃尔德:“美国宗教与政治”,《交流》,2000年第一期。
- ²⁸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第142页。
- ²⁹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 ³⁰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p.104.
- ³¹[美]帕利坎著,杨德友译:《历代耶稣形象》,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11页。
- ³²出处同上,第215页—第216页
- ³³Timothy A. Bynes,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hierarch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Fall95, Vol.108 Issue 3, p.498.
- ³⁴Kenneth D.Wald, “Religious Elite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the Bishops’ Peace Pastoral”, *Review of Politics*, Winter92, Vol.54 Issue1, pp.116-118.
- ³⁵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282.
- ³⁶*Selected Works of Joseph Bernardin Volume 2 Church and Society* (Collegeville, Minn. : : Liturgical Press, 2000), p.38.
- ³⁷Kenneth D.Wald, “Religious Elite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the Bishops’ Peace Pastoral”, p.122.
- ³⁸*Selected Works of Joseph Bernardin Volume 2 Church and Society* (Collegeville, Minn. : : Liturgical Press, 2000), p.38.
- ³⁹Ronald G.Musto, *Catholic Peace Tradition* (Oribis Books, 1986), p.262.
- ⁴⁰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
- ⁴¹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p.37.
- ⁴²*Ibid.*, p.111.
- ⁴³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321.
- ⁴⁴*Ibid.*, pp.282-287.
- ⁴⁵Timothy A. Bynes,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hierarchy”, p. 497.
- ⁴⁶美国天主教主教团(NCCB)和美国天主教会议(USCC)两者共享人员和办公地点,只是前者是神职团体,后者是民间团体。
- ⁴⁷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p.273.

⁴⁸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288.

⁴⁹沈善荣：“论冷战时期世界和平运动的特点”，载《东南亚纵横》2002年10期，第47页。

⁵⁰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p.5, p.50.

⁵¹美国教友派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是美国教友派（贵格派）的全国性和平组织，成立于1917年致力于维护全球和平。

⁵²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第293页。

⁵³[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558页。

⁵⁴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pp.50-51.

⁵⁵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第294页—第295页。

⁵⁶美国天主教会议的前身是美国天主教福利会议，1966年改用现名。它是美国天主教会进行游说活动的主要机构，雇员达到300人，年度预算高达4000万美元。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的规定，这类免税机构可以进行游说活动，只要其费用不要超过该组织预算的一定比例。而这一比例根据最新的最高法院判例是5%。

⁵⁷Kenneth D.Wald, “Religious Elite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the Bishops’ Peace Pastoral”, p.114.

⁵⁸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p.75.

⁵⁹Andrew M. Greeley, “Why the Peace Pastoral Did Not Bomb,”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12 April 1985.

⁶⁰Kenneth D.Wald, “Religious Elite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the Bishops’ Peace Pastoral”, p.131.

⁶¹菲利浦·贝里根，美国天主教著名和平人士，从1968年起，多次进入征兵办公室，焚烧征兵名单，于1969年8月被捕。进入80年代以后，他和追随者的主要活动目标转移到核武器问题。参见 Ronald G.Musto, *Catholic Peace Tradition*, p.258.

⁶²Ronald G.Musto, *Catholic Peace Tradition*, p.259.

⁶³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p.63.

⁶⁴温伯格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伊格尔伯格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斯托时任裁军署长；罗尼时任总统军控事务顾问；布朗，卡特时期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参见 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294.

⁶⁵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288.

⁶⁶[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第549页。

-
- ⁶⁷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p.65.
- ⁶⁸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286.
- ⁶⁹Ibid.,p.288.
- ⁷⁰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p.49.
- ⁷¹Ibid., pp.55-56.
- ⁷²Ibid.,p.100,p.105.
- ⁷³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p.11, p.118.
- ⁷⁴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290.
- ⁷⁵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p.120.
- ⁷⁶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300.
- ⁷⁷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p.13.
- ⁷⁸Denise Shannon, “The Bishops Lobby”, *Humanist*, Sep/Oct 93, Vol.53 Issue 5, p.25.
- ⁷⁹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p.290-293.
- ⁸⁰董小川:《20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 第 128 页。
- ⁸¹Peter L.Benson and Dorothy L. Williams, *Religion on Capitol Hi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165.
- ⁸²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296.
- ⁸³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p.45.
- ⁸⁴[美] J•D•亨特著, 安荻等校:《文化战争》, 第 94 页。
- ⁸⁵Kenneth D.Wald, “Religious Elite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the Bishops’ Peace Pastoral””, p.138.
- ⁸⁶David C.Leege, “Catholics and the Civic Order: Parish Participation, Politic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Review of Politics* 50(1988),p.722.
- ⁸⁷Kenneth D.Wald, “Religious Elite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the Bishops’ Peace Pastoral””, p.139.
- ⁸⁸Ibid.,p.132.
- ⁸⁹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294.
- ⁹⁰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pp.164-170.

⁹¹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p.10.

⁹²*Ibid.*, p.104.

参考文献

中文书目：

1. 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 [美]W·赫勃格著，陈佑舜译：《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4年
3.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美]帕利坎著，杨德友译：《历代耶稣形象》，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5.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东方出版社，1991年
6. [美]J·D·亨特著，安荻等校：《文化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7.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美]梅尔利·D·彼得森注释编辑，刘祚昌、邓红风译：《杰斐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9.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文论文：

1. 周宝根、李彬：《军备控制中的非军事因素》，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
2. 孙向丽、王德礼：《核军备控制的研究现状与前景》，载《核物理动态》1995年第4期
3. 沈善荣：“论冷战时期世界和平运动的特点”，载《东南亚纵横》2002年10期

英文书目：

1. 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95)
2. Allen D.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The Role of Religious Lobbies in the American Polity* (Knoxville,Tenn.: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3. *Selected Works of Joseph Bernardin Volume 2 Church and Society* (Collegeville, Minn. : : Liturgical Press, 2000)

4. Eric O.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Thomas R.Rochon and David S.Meyer, *Coalitions&Political Movements —The Less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6. Ronald G.Musto, *Catholic Peace Tradition* (Orbis Books, 1986)
7. Kenneth D.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7)
8. Peter L.Benson and Dorothy L. Williams, *Religion on Capitol Hi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 Felician A. Foy & Rose M.Avato Eds.: *1998 Catholic Almanac* (Huntingto, IN.: Our Sunday Visitor, Inc., 1997)

英文论文:

1. Timothy A. Bynes, "Th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hierarchy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Fall95, Vol.108 Issue 3, p.497
2. Denise Shannon, "The Bishops Lobby", *Humanist*, Sep/Oct93, Vol.53 Issue 5, p.21
3. Kenneth D.Wald, "Religious Elite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the Bishops' Peace Pastoral", *Review of Politics*, Winter92, Vol.54 Issue1,p.122
4. Andrew M. Greeley, "Why the Peace Pastoral Did Not Bomb,"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12 April 1985
5. David C.Leege, "Catholics and the Civic Order: Parish Participation, Politic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Review of Politics* 50(1988), p.722

译名表

Augustine	奥古斯丁
Aquinas, Thomas	托马斯·阿奎那
Berrigans, Philip	菲利浦·贝里根
Bernardin, Joseph	约瑟夫·贝纳丁
Brown, Harold	哈罗德·布朗
Clark, William P.	威廉·P·克拉克
Cook	库克
Eagleberger, Lawrence	劳伦斯·伊格尔伯格
Falwell, Jerry	杰里·福尔韦尔
Forsberg, Randall	伦德尔·弗斯博格
Greeley, Andrew	安德鲁·格雷
Hannan, Philip	菲利浦·汉纳
Hanson, Eric O.	艾瑞克·O·汉森
Hertzke, Allen D.	艾伦·D·赫茨克
Hyde, Henry	亨利·海德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John Paul II	若望·保禄二世
Krol, John	约翰·卡罗尔
Kennedy, John F.	约翰·F·肯尼迪
Linebaugh, David	大卫·林伯夫
Manning, Timothy	蒂莫西·曼宁
McFadden, James	詹姆斯·麦克法登
Meyer, David S.	大卫·S·梅尔
Mohony, Roger	罗格·莫汉尼
Molander, Roger	罗格·莫兰德
Musto, Ronald G.	罗纳德·G·穆斯托
O' Connor	欧康纳
O' Neill, Thomas P.	蒂普·奥尼尔
Pius XII	庇护十二
Paul VI	保禄六世
Rochon, Thomas R.	托马斯·R·罗肯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罗斯福
Rostow, Eugene	尤金·罗斯托

Rowney, Edward
Schlesinger, James
Sheen, Fulton
Scovill, Herbert
Smith, Alfred
Smith, Gerard
Sonnenfeld, Helmut
Spellman, Francis
Sutherland, Anne
Wald, Kenneth
Weinberger, Casper
Willens, Harold

爱德华·罗尼
詹姆斯·施莱辛格
福尔顿·谢恩
赫伯特·沙维尼
艾尔弗雷德·史密斯
杰拉德·史密斯
赫尔姆特·桑尼福德
弗兰西斯·斯柏曼
安妮·萨瑟兰
肯尼思·沃尔德
卡斯伯·温伯格
哈罗德·维勒斯

后 记

当我完成这篇论文时，首先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感谢。回想着论文从开题到完成，老师们给予我的帮助难以用言语表达。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徐以骅教授。三年来，徐老师春风化雨般的教诲，让我受益非浅。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从选题立意到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我取得的点滴进步都和徐老师的悉心指点分不开。看着徐老师逐字逐句仔细修改过的初稿，让我既心存感激，又倍感惭愧。

同时也要感谢沈丁立老师对我的启发和所提的宝贵意见。沈老师精彩的军控课程给我很大的启发，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而在我写出最初不成熟的部分章节时，沈老师又给我热情的鼓励和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系里所有的老师，你们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终生受益。你们对学生们的关心和爱护是我们能够取得进步的源泉。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对我含辛茹苦的培养和不计回报的支持，很难想象我能够取得今天的进步。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黄凯 日期: 2003.5.19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黄凯 导师签名: 徐以群 日期: May 18, 2003